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图景

何玉芳 李 戈

**摘 要**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严谨的逻辑、完整的系统开辟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开启了区别于西方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径，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图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途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图景

[中图分类号] D64;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51X (2023) 02 - 0022 - 1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概括与经验总结。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和使命，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探索出一条契合当今时代特征与人民美好愿望的新型道路模式——中国式现代化。

虽然“现代化”发轫于西方国家，但需要明确的是，“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式现代化并非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培养时代新人重要论述研究”（批准号：19BKS107）。

**【作者简介】** 何玉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044，电子邮箱：he\_yufang@126.com；李戈，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邮政编码：100044，电子邮箱：education2022bjtu@163.com。

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归结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①</sup>等五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起着基础性、关键性、保障性和普惠性的作用，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人与自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内部创造性主体力量和外部依赖性客体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两者的和谐共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高度契合的体现，并具有原创性。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本体论构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产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生态民生观，以及打造“清洁美丽世界”的全球治理观等基本观点均具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蕴。深刻领悟并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我国的创新性发展。

## 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构建崭新的生态文明观，离不开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对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中国历史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漫长岁月中经过数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释与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全新的范式转换和思维拓展，最终演变成为具有当代价值的理论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泥土中，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开启了实现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汲取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智慧，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方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博大精深，对于当今建设生态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对于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有着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思考与论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多反对将天与人对立或割裂开来，主张道法自然、遵从规律，以及天人合一、平衡协调，认为所谓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绝非天渊之别，而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1 页。

是相类相通的。

崇敬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意蕴。认为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并顺从自然规律。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①</sup>，其中的“自然”二字并非代表全部物理状态中的自然物质，其中蕴含了“规律”之意。“道法自然”即指自然而然的状况，认为人类的活动要顺应规律，且有为不妥为、无为无不为，这与儒家的“中庸”与“致中和”思想相贯通，即人类在强调万物的自然时，绝不能忘记赋予万物自然之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sup>②</sup>，就是告诫我们在开展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复其自然。二是秉承“和”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可以和睦相处、和谐统一。崇尚和谐的“性格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其中“和”作为基本的哲学范畴，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也成为儒家谋求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和实生物”的规则要求万物只有在“和”的环境中才能获得生长，人与自然唯有和睦相处，国家方可兴盛、个人才能幸福。“制天命而用之”<sup>③</sup>，后世众多学者都曾赞扬和高度评价过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这一唯物主义的天然天道观，人与天是“不相胜”的关系，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才是造福人类的关键。《中庸》中也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sup>④</sup>，“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sup>⑤</sup>等体现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的语句。三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无法完全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存在，但自身又有着高于自然的智慧。战国时期思想家庄子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sup>⑥</sup>，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规定了各种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使其自然性不断被擦除，而修行的目的在于“绝圣弃智”，因此在冲破人们身上的重重枷锁与藩篱的同时，应释放人性，重归自然，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东汉思想家王充说，“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sup>⑦</sup>。既然人与自然界的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顺应自然便是人类智慧的绝佳体现，处于理性状态的人势必依照规律来适当地开展生产生活。北宋理学家张载也说，“天人不可须臾强分，《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sup>⑧</sup>，他反对将天与人强行分割开来，而要将二者融为一体。

① 饶尚宽（译注）：《中华经典藏书·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3页。

② 饶尚宽（译注）：《中华经典藏书·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0页。

③ 张燕婴、王国轩、蓝旭等（译注）：《中华经典藏书·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8页。

④ 王国轩（译注）：《中华经典藏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9页。

⑤ 王国轩（译注）：《中华经典藏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页。

⑥ 孙通海（译注）：《中华经典藏书·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6页。

⑦ 黄晖（译注）：《中华国学文库·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11页。

⑧ 章锡琛（译注）：《理学丛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2页。

中华文化中独有的“道法自然”“天与人，不相胜”“仁爱万物”“天人合一”等观点，可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生态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应依照时代的发展对其进行合理的现代转换。立足新时代，必须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①</sup>这一关键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应有之义，它不仅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到生命共同体的高度，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传统生态理念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宏图，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大自然抚育了人类，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各种物质条件，人类在根据自身意愿和需要开发自然资源时，作为对自然母亲的回报，理应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使“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sup>②</sup>。其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为建设美丽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是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中方举办的边会主题。中国明确提出了要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一道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的各种挑战，并且希望与会国家早日形成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具有雄心壮志和求真务实精神的生态环境建设框架。不仅如此，中国还率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推动了具有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的签订，并以构建绿色“一带一路”为责任担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近年来，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研发，到东南亚低碳环保建设，再到南美洲垃圾发电EPC项目落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绿色实践“行动胜于雄辩”。

总之，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融入现代化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时空，才能避免重蹈西方式现代化的覆辙，谱写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严谨的逻辑、完整的系统开辟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弥补了以往西方现代化因其“殖民化”起点和“全球代价转嫁”路径而导致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持续性。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必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走人与自然和解之路，遵循“叠加式”与“并联式”现代化发展逻辑，实现工业文明、知识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力求摆脱西方“串联式”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页。

<sup>②</sup> 张燕婴、王国轩、蓝旭等译注：《中华经典藏书·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1页。

发展中只能在某一阶段专注于一两个目标，且必须待阶段性目标完成后才能顾及其他方面的弊端，体现了我国发展战略的后发赶超性。

## 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人民至上”情怀和“胸怀天下”价值理念，从更为宽广、深邃的视野创新了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外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西方“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宝贵之处，应该说这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生态文明理论的历史性超越。由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是站在“地球优先”角度、以降低人类尊严构建的生态文明理论，因此附带了后现代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特质，故而从根本上混淆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关系，彻底否定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

现实的环境危机要求人类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反思和总结，西方环境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基础之上逐步兴起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广泛采纳“道义”色彩理论、资本逻辑和功利主义的观点，以“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认识论为起点，借助生态学科的开放性和整体性规律，对人际伦理学展开了彻底的批判。其核心观点在于，鼓吹突破传统伦理观念、将道德关怀局限在人类彼此之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际伦理学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他们忽视甚至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利益和需要，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崇荡然无存。其缺陷在于，它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历史维度，单纯将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根源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因此完全割裂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性。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者热衷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并倡导“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从奥波尔德构筑的“大地伦理”，到保罗·泰勒开创的“固有价值”，再到罗尔斯顿主张的“自然优先于文化”，都是聚焦于价值观的争论与分歧，他们那带有抽象的、烦琐的经院哲学般的辩证，恰恰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实境遇。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逻辑悖反，诸多生态问题的共同渊源正是资本主义遵循“唯利是图”法则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者奉行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截然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回应人民普遍关切、维护人民环境权益、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人民至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是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条主线，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追求。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行为，实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辩证统一。明确了在认识并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应当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在占有、交换、分配和使用各类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冲突。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环境民生论”为起点和归宿，站在及时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和实现人民福祉的前瞻性、战略性、紧迫性的高度阐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以公众诉求为导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的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人民至上”理念，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的正义价值取向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民族未来、祖国发展紧密结合，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建设好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与千秋伟业。围绕这一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sup>①</sup>。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价值观不仅表达了浓厚的人民情怀，也蕴含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崇高价值旨归。生态环境呈现出整体性、关联性等鲜明特征，在整个生物圈，物质的迁移转化是没有国界的，环境污染也是没有国界的。人类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共享同一片星空，尽管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拥有独立的自主权，但在生态环境方面却是高度依赖的，因此都应肩负起创造绿色生活、保护自然环境的应有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sup>②</sup>，而且“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sup>③</sup>。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sup>④</sup>。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挑战，各个国家应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超越性视野和包容性思维来应对困境，摒弃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平等协商的手段承担起各自的环境保护责任，通过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商生态文明大计、共建地球绿色家园。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55页。

②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2版。

④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59页。

### 三、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途径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有效解决当前所面临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理念是否对头、是否切合实际，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当前各项事业发展的具体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sup>①</sup>。可以说，发展理念管根本、管方向、管全局，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指导性作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有一个总体的要求，做到标准明确、思路清晰、方向一致。

20世纪中叶以来，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使得地球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地球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新理念的提出似乎可以很快将人类拉入一种极其融洽、和谐的生态环境当中，空间地域的界限和多元文化的差异将渐渐消除，人类也将共享生态文明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然而，这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精心打造的“理想国”，在民族资本日益成为国际资本、世界各国日渐“寰球同此凉热”的时代（熊小果，2021），西方生态殖民主义已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在肯定西方式现代化推动人类科技进步和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在于“以资本逻辑主导一切”，它受制于资本、屈从于资本、服务于资本。因资本的运行逻辑统摄着政府的思维逻辑和社会的运行规则，其整体发展的核心指向便是利润最大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由此转换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于是生态殖民主义衍化出一些新特征，即生态资源的规模化掠夺、生态污染的结构化转移、生态壁垒的制度化设计、生态道德的系统化崩塌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全球资源掠夺、转嫁生态风险、冲击他国生态安全的过程。不同于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当下生态掠夺的方法与手段更加隐蔽、多元和分散，且因打着人道主义援助、国际共同合作的旗号而更具欺骗性与蛊惑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规避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就应变革漠视生态环境制约、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提升的传统发展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这一带有原创性、突破性和变革性的创新理念。作为统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纲要和大逻辑，“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努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针对如何有效平衡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两者之间关系而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的最佳解答，并且科学回答了“实现什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24页。

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sup>①</sup>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了更好地贯彻“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sup>②</sup>这一价值理念，并有效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减污降碳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sup>③</sup>。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是“坚持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另一种表达，提倡的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经济生产生活要适应自然运行的规律。生态环境保护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将以往“用环境换取增长”的传统观念转变为“环境优化增长”的创新理念。事实上，良好的生态环境自身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出综合效益，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务必政策到位、落实到位”<sup>④</sup>。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要及时、有效遏制无休止的资源掠夺与环境污染，防止“公地悲剧”与“公有资源灾难”的上演，即防止私人享用免费午餐而呈现出的狼狈景象。

总之，要依靠科技和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以系统工程思路抓好生态环境建设，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用最严密的法治惩治污染行为。总之，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做到在合理利用、开发资源中求发展，从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路径。

#### 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完整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sup>⑤</sup>。对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关键作用与重大意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67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2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指出人和人类社会都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历史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要求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和结构功能，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sup>①</sup>，“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sup>②</sup>。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为出发点，更加注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力求保持双方在彼此影响、彼此促进的开放延续过程中维系持久、稳定、协调的共存共荣关系。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也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因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需要，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必定是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所缔造的人类文明，带有鲜明的“贪婪本性”和“反生态性”，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追求资本无限增值的发展逻辑势必加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得到根治。伴随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张，生态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西方国家，而是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社会安全的重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大踏步前进、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但发展的背后也累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新时代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与基本前提，因此要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民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将“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sup>③</sup>作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科学布局，是一个呈现开放样态、与时偕行的体系，其发展经历了由“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有效促进了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尽管涉及不同的发展领域，且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内容与要求，彼此之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从现实层面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的严峻形势”（刘毅、寇江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2020)。“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sup>①</sup>。因此，不能单纯地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附属品”。要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基本前提，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旨在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新时代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既要重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作用，又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的结构性融合，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丰富的生态滋养。

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其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经济发展困境的内在要求。要化解经济平稳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元关系，就必须明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我国制定并实施了诸多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的政策。如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提质增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让人们看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以丰富、优质的生态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与资金，厚植生态优势、壮大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式现代化绿色经济发展之路。其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举的旗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sup>②</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所要求的主体强化、制度完善、思想提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高度、实践程度、践行力度，前所未有，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塑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作为软实力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严格遵循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四，生态文明建设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sup>③</sup>，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民生本质与民生理念，也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迫切渴望。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9页。

② 习近平：《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人民日报》，2016年5月4日，第9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

## 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发展状况、历史沿革及未来趋势作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三个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更宽广、更深邃的视野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凝结着对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睿智思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价值意蕴。

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不同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将生态文明片面地理解为人类活动尚未涉足的“荒漠地带”,进而机械地排斥甚至否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也不同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以科技发展和自然资源市场化、资本化为手段,一味盲目地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理论来源的科学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解决人与自然冲突问题的方法,并有效化解了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运用、生态文明建设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引领全球生态治理、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文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尽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资源总量过度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的执政目的出发,适时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扬生态文明建设鲜明旗帜,且务必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为引领。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生态保障。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只有建设起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有、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蓝图,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崭新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是资本驱动下的现代化,其经济社会发展往往伴随着阶级冲突、贫富差异、精神空虚、利益固化、生产和生态不和谐等一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系列问题，从而导致了污染治理成本的高昂和部分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最终引发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对立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唯利是图的本性，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路解决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阵痛问题。在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要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聚焦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模式，塑造创新性、综合性、多元性、叠加性的发展效应，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新类型。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使用“传统—现代”的框架结构，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比照中揭示现代化的动力、规律和特征，将西方文明当作人类的典范，将西方现代性塑造成历史的终点，因此是典型的内因论，即强调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现代性因素缓慢累积的必然结果，并以经济现代化为起点，逐步扩散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尽管西方现代化缔造了人类现代文明，但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剥削制度，从探寻新大陆、抢占全球资源到对外殖民、强行资本输出，西方现代化一再展现出欺凌霸弱的强权本性。反观中国式现代化，是按照“人民逻辑”展开、以公众利益为驱动的现代化，它破除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完全支配，克服了西方传统现代化进程中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滥用自然资源为代价创造物质财富的发展通病，从而有利于缓解传统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象。中国式现代化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鲜亮旗帜，开启了区别于西方的人类现代化新路径，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 参考文献

刘毅、寇江泽（2020）：《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人民日报》，5月14日，第1版。

熊小果（2021）：《生态殖民主义与国家生态安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81—87页。

张惠远、冯丹阳、周美华等（202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实践探索》，《城市与环境研究》第3期，第31—41页。